



汉化与胡化： 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高荣 贾小军 濮仲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汉化与胡化： 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高 荣 贾小军 濮仲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化与胡化：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 高荣，贾小军，濮仲远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3
ISBN 978 - 7 - 5203 - 1466 - 4

I. ①汉… II. ①高…②贾…③濮… III. ①民族融合—研究—甘肃—
汉代、唐代 IV. ①K28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016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25
插 页 2
字 数 371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一 关于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问题	(1)
二 汉唐时期河西的多元民族结构	(5)
(一) 秦汉时期的月氏、乌孙、匈奴及氐、羌等族	(6)
(二) 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鲜卑及卢水胡、吐谷浑	(8)
(三) 北朝隋唐时期河西的突厥、回鹘和吐蕃	(12)
三 汉唐时期河西各民族的相互影响	(16)
(一) 汉武帝以后河西民族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	(16)
(二) 汉族对游牧民族的影响	(18)
(三) 游牧民族对汉族的影响	(23)
(四) 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	(26)
四 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及其特点	(29)
(一) 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条件	(29)
(二) 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不同类型	(32)
(三) 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特点	(41)
第一编 河西建郡前的民族迁徙与社会生活	(45)
一 河西建郡前的民族构成	(45)
(一) 月氏、乌孙在河西的活动	(45)
(二) 匈奴的崛起与月氏、乌孙的西迁	(49)
(三) 匈奴统治河西	(53)
二 建郡前河西诸族的社会生活	(54)

►► 汉化与胡化: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一)秦汉之际河西局势的变化与畜牧业发展	(55)
(二)建郡前的河西农业与手工业	(59)
(三)建郡前的河西社会生活习俗	(63)
三 汉、匈争夺河西	(68)
(一)汉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	(68)
(二)汉武帝对匈奴政策的转变	(70)
(三)对河西各族的管理	(72)

第二编 汉魏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一 汉代河西的人口流动与民族融合	(77)
(一)汉代河西的匈奴与汉族人口流动	(78)
(二)汉代河西的羌族部落及其活动	(88)
(三)汉代河西的小月氏	(103)
二 汉化与羌化:汉魏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115)
(一)河西的诸种羌	(116)
(二)河西羌人的“汉化”	(123)
(三)东汉以来河西的“羌化”趋势	(129)
三 卢水胡的发展历程:汉魏以来河西民族融合的缩影	(133)
(一)卢水胡的族源	(133)
(二)汉代卢水胡源自小月氏	(137)
(三)汉魏以来河西卢水胡的发展	(140)

第三编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一 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融合诸层次	(144)
(一)物质性融合	(145)
(二)社会性融合	(148)
(三)精神性融合	(151)
二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大势	(152)
(一)河西民族之地理分布	(153)
(二)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融合态势	(155)

三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地区的管理制度	(156)
(一) 魏晋五凉护羌校尉之置废	(157)
(二) 五凉护军制度	(165)
四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各族民众的生存空间	(172)
(一) 河湖与绿洲: 魏晋十六国河西民众的基本生存空间	(172)
(二) 绿洲之上的河西城镇	(174)
(三) 城镇之外的河西村坞	(178)
(四) 城镇村坞中的河西各族民众居所	(180)
(五) 不同居所中的河西各族民众	(182)
五 魏晋十六国河西墓葬壁画所见民族融合	(185)
(一) 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中的河西各族	(186)
(二) 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中的河西各族解析	(195)
(三) 魏晋十六国河西主要民族及民族融合趋势	(201)
六 十六国时期河西“掳掠”经济与民族交流	(203)
(一) 后凉、南凉与北凉的“掳掠”经济	(204)
(二) 前凉与西凉的“掳掠”经济	(207)
七 后凉政权与“氐族本位政治”	(210)
(一) 汉代以来河西的氐族	(211)
(二) 氐族后凉政权的建立	(214)
(三) “氐族本位政治”在河西的推行	(216)
八 北凉统一与河西民族融合趋势	(226)
(一) 三凉并立与北凉统一河西	(226)
(二) 北凉时期的河西民族融合趋势	(237)
九 北朝时期的河西民族融合	(238)
(一) 北魏徙凉州士民于平城	(239)
(二) 北魏因俗治凉与怀柔杂胡	(241)
(三) 北朝时期进入河西的西域人	(243)
(四) 佛教传播与北朝河西民族融合	(244)

第四编 隋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248)
一 隋代经营河陇的民族战略	(248)
(一)隋文帝对突厥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策略	(248)
(二)隋炀帝“混一戎夏”的大业	(252)
(三)隋炀帝的河西战略	(257)
(四)隋炀帝西巡路线	(260)
二 唐前期的河西民族融合	(267)
(一)唐初“怀柔远人”“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	(267)
(二)唐前期对河西少数民族的管理——羁縻府州的设立	(271)
(三)河西的吐谷浑部落	(289)
(四)唐朝与吐谷浑的关系——以西北出土的墓志为中心	(295)
(五)著藉之民——关于唐前期凉州粟特后裔家庭的考察	(308)
三 吐蕃统治时期河西民族关系的新变化	(315)
(一)吐蕃入迁河西	(316)
(二)8世纪中期以后河西的吐蕃化	(326)
(三)吐蕃统治下的河西各族	(334)
四 甘州回鹘的建立与周边地方政权	(348)
(一)回鹘向河西的迁徙	(350)
(二)9世纪中期以后河西的“回鹘化”趋势	(354)
(三)9世纪中期以后河西诸民族与丝路交通	(360)
(四)晚唐五代时期河西走廊民族融合的特点	(369)
参考文献	(372)
后 记	(381)

绪 论

河西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地区，当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众多民族和部落生息繁衍的理想场所。汉武帝以后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使河西成为沟通内地与西域的纽带，而且也是中国与广大的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地区进行政治联系和经贸文化交流的交通咽喉。两汉、隋唐时期，河西始终是中原王朝与北方、西北游牧民族激烈争夺之地，也是民族迁徙、交流最为广泛、活跃之区；至于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更是各民族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在长期的交往交流过程中，进入河西的各民族之间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相互影响，有的则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河西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交流史。历史上河西各民族的活动，不仅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且对于保障西北边疆安全稳定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汉唐时期，曾出现过空前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也更为活跃。为便于说明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迁徙交流和发展演变的历史，有必要对学界关于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问题的讨论作简要回顾。

一 关于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术界关于“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的理解和表述都存在明显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有着本质的不同。民族融合是指消灭了一切民族差别，使全世界各民族都融合为一个既

非甲民族又非乙民族的、从未有过的新民族,是一个拥有共同经济文化生活的整体。因此,不仅阶级社会不存在民族融合,即使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也不可能有民族融合;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共产主义后,才能实现民族融合。民族同化则是丧失本民族特性而变成另一民族,是指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使小的、生产力低的民族同化于自己,实际上就是落后民族加入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体系,也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同化基本上都是强制性的,自愿同化是例外。因此,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民族的消亡问题。但民族同化只是个别民族的消亡问题,只能消灭一部分民族之间的民族差别,即由这一个民族变成另一个民族;民族融合则是一般民族的消亡问题,即消灭一切民族间的差别,把全世界所有民族的人们都融合为没有民族差别的新人类。因此,历史上只有民族同化而不存在民族融合。^①

另一种意见认为,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客观存在的两种现象。前者是由经济文化交流而实现的自然渐进过程,是进步的现象;后者虽然是通过政治强制手段使一个民族融合于另一个民族,但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②这一观点被学界普遍接受并进一步完善,众多学者在讨论民族融合的同时,并不讳言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民族同化问题。他们认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由于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民族同化则是统治民族的统治阶级通过政治强制手段迫使其他民族改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改从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等,因而也可称为“强迫同化”;而民族融合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习惯上指所有民族结合方式的总称,包括两个以上的民族因错居杂处、相互通婚、相互影响、取长补短逐渐成为第三种民族,或一个小民族融入大民族的历史现象。因此,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大势所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华夏族就是由夏、商、周三族融合而成的。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又融合了大量杂居中原的戎、夷、蛮、狄而变得更加多元化,到秦汉时终于形成了

① 参见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章鲁《谈谈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区别问题》,《新建设》1962年第6期。

② 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5页。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此后，又不断有其他民族融入汉族。也就是说，不论是血统还是文化，不同时期的汉族都是不同的。汉族如此，其他少数民族亦然。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的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是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各民族也不例外。^①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正是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生、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还有的学者结合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进一步指出，民族融合是指两个以上的民族或其一部分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中，互相吸收其特点，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现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满族、回族、东乡族、撒拉族、裕固族、保安族等，都是如此。民族同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完全丧失其民族特性，被吸收于另一个民族之中，其中既有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及部分蒙古、满等族；也有大量被掳掠、或因避难而进入边疆地区或处于内地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汉族，由于政治强制手段而被同化的情况，如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很多汉族被同化，即属此类；至于少数民族之间的同化现象，则更为普遍。正是由于历史上各族间的相互同化，出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但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虽不乏因通婚或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而自然同化的现象，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历史上的民族同化主要还是强迫同化。^②

我们认为，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固然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客观存在的两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融合就一定形成新的民族，而民族同化也未必完全丧失本民族的特性。不论是民族融合还是民族同化，民族间的影响都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当然，由于各自政治实力强弱或经济文化

① 参见谷苞《民族都是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形成和发展的——兼论有关民族融合的一些问题》，原载《民族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收入谷苞《民族研究文选（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孙进己《论民族融合的不同类型及中华民族融合的不同状况》，《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

② 参见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导论卷》，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8页。

发展水平高低不同,在相互影响中的地位有主次之分,其影响力大小也存在一定的差别。有的学者认为:“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区别:只在于融合更多保留了两个民族的特征,同化主要保留了一个民族的特征。”^①但就总体而言,不论是强制同化还是自然融合,各民族在长期的交流交往中,总是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各自的差异性逐渐缩小,而共同性则不断增多,很多方面渐趋一致,进而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汉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其他各民族成分的同时,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入了新的血液。^②因此,我们在讨论汉唐时期河西民族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更注重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而不再严格区别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

汉唐时期所以能够创造出繁荣发达的封建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能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宽广博大的胸怀,借鉴吸收国内外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因素,从而输入新鲜血液,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我。河西走廊位居丝绸之路交通咽喉,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融荟萃之地,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诚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③在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不仅东来西往的使者、商人络绎不绝,而且各种“外来宗教如佛、如袄、如景、如摩尼,皆先后集其间”。^④汉唐时期的河西,在我国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五凉文化,更是北朝及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对此,陈寅恪先生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

① 孙进己:《论民族融合的不同类型及中华民族融合的不同状况》,《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3页。

③ 季羨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

④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吴泽主编,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8页。

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

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①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有利于域内各民族间的和谐相处和交流融合，也吸引了大量“内地儒英”和“胡商贩客”来河西讲学授业、互市贸易，极大地促进了河西的民族交流和文化发展，催生哺育了辉煌灿烂的“五凉文化”。而其所以能够“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正是得益于该时期各民族的交流融合而实现的。“河西文化输入于魏”，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民族融合。因此，民族融合的核心是文化上的取长补短。

二 汉唐时期河西的多元民族结构

河西在历史上就是多民族杂居共处之地。先秦以来，羌、氐、月氏、乌孙、匈奴、鲜卑、卢水胡、吐谷浑、吐蕃、回鹘、突厥、粟特、党项、蒙古等都曾在河西活动。各族在民族大迁徙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融合发展，使河西民族结构逐渐多元化。除汉族外，历史上还有很多民族如月氏、乌孙、匈奴、鲜卑、吐蕃、回鹘、党项等，都曾一度是河西的统治民族，其中氐、鲜卑、卢水胡、吐蕃、回鹘等族还在河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41页。

(一) 秦汉时期的月氏、乌孙、匈奴及氐、羌等族

月氏和乌孙都是河西地区土生土长的古老民族,他们曾共居于“敦煌、祁连间”。其中月氏的活动地区主要在今河西走廊中东部的张掖、武威一带,乌孙的游牧地则仅限于张掖以西、敦煌以东。^① 独具特色的沙井文化和骊马文化,就是月氏和乌孙在河西活动的遗存。约在战国末期至秦初,月氏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强大的游牧民族,故有“东胡强而月氏盛”^②之说。强大的月氏打败乌孙,并杀死其首领难兜靡,迫使乌孙退出河西,从而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但是,这样的局面为时不久。就在楚汉相争之时,匈奴在冒顿单于(前209—前174年)带领下迅速崛起,东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进而成为河西的新主人。

史载,匈奴先祖淳维为夏后氏之苗裔,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③ 在最高首领单于之下,分别设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二十四长。河西地区归右贤王管辖,其下又有浑邪王、休屠王、觿得王、折兰王、庐侯王等。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等两次进兵河西,大败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河西遂入汉朝版图。

据《汉书》卷28下《地理志》载,敦煌郡有“氐置水出南羌中”,张掖郡辖有氐池县。以“氐”名县、名水,足见当时张掖、敦煌郡一带已为数不少的氐人活动。而武威郡又有鸾鸟县,如果对照《逸周书》卷7《王会》关于周成王时“氐羌以鸾鸟”来献的记载,则武威郡也有氐人。因《王会》成于战国时期,其所记族名、地名及物品名,应是当时人们有所耳闻的,由此判断:“可能从战国时起,今河西走廊就已经有氐人居住。”^④ 然而,直到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文献中始有氐

① 参见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0—81页。

②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87页。

③ 同上书,第2879页。

④ 杨铭:《氐族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8页。

人迁徙河西的记载,^①但其具体活动情况仍语焉不详。从三国时人鱼豢《魏略》在叙述汉代氐人分布区时,将福禄(酒泉郡禄福县,今酒泉市肃州区)与汧、陇并列^②的情况来看,此次迁往河西的氐人应是相当可观的。以致前凉时期,氐羌之众已成为其军队的主力 and 政权的支柱了;^③嘉峪关等地魏晋墓葬壁画中很多编发的氐人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河西氐人的大量存在。386年氐人吕光建立后凉政权,使氐族在河西的政治影响达到顶峰,但随着403年后凉政权的灭亡,河西氐人也逐渐汉化而不复存在了。

河西归汉前已有羌人活动。汉代河西的很多河流和地名就是以羌命名的,如张掖郡觿得县有羌谷水、泽羌谷,酒泉郡禄福县呼蚕水发源于南羌而流入羌谷,敦煌郡南籍端水和氐置水皆出于南羌等。虽然羌族并不像月氏、乌孙和匈奴那样,成为某一时期控制河西的主体民族,但其在河西的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有研究认为,“敦煌”之名就来自羌语译音。^④根据敦煌文书的记载,位于敦煌县东五十里的破羌亭,就是由汉宣帝时破羌将军辛武贤击破羌戎而筑的,^⑤可见敦煌一带羌族势力之盛。东汉魏晋时期,河西羌人数量剧增,按其居住地可分为武威种羌、张掖种

① 《汉书》卷6《武帝本纪》载,是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4页。

② 《三国志·魏书》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评曰”注引《魏略·西戎传》云:“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58页。

③ 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106、143页。

④ 李德贤:《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它》,《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关于敦煌之得名,学界还有不同解释,但基本都认为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参见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2年第3辑;王宗维:《“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余太山:《大月氏与大夏综考》,《中亚学刊》1990年第3辑;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林梅村:《祁连与昆仑》,《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王欣:《吐火罗在河西一带的活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⑤ 参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1页。

羌、酒泉种羌和敦煌种羌。他们在“汉化”的同时,其自身势力和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不仅使周边的卢水胡和小月氏等游牧部落出现了“羌化”趋势,而且对河西汉族民众的生产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十六国时期,羌族姚兴后秦政权也将其势力伸入河西,据有西平的南凉秃发利鹿孤、以张掖为都的北凉沮渠蒙逊和远在敦煌的西凉李暠等河西割据势力,都纷纷遣使来降,足见羌人在河西势力之大。

(二) 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鲜卑及卢水胡、吐谷浑

河西的人口流动,在秦及西汉时主要是月氏、乌孙、匈奴等举族迁出和汉族的大量移入;汉魏以来则不仅有氐、羌、鲜卑等族大量迁徙,还有很多来河西避难的内地人口。其中鲜卑是迁徙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民族之一。正如赵俪生先生所论:“在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八次较大的冲突融合中,鲜卑的融合是最充沛、并且多样的,值得当作民族关系史中的一个典型来观察。”^①

鲜卑族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东麓北部,后逐渐南迁。汉桓帝时,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尽据匈奴故地”,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其中“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②可见汉末敦煌及河西走廊以北地区已有鲜卑部落活动。中平二年(184年),应劭反驳朝臣议欲招募鲜卑以镇压边章、韩遂之乱时曾指出,鲜卑“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丑虏,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③不论是朝臣议欲招募鲜卑以平叛,还是以往武威太守率鲜卑兵征讨叛羌,都说明河西地区的鲜卑势力是相当强大的。及至魏晋时期,由于大批鲜卑人向西北迁徙,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和分布格局。曹魏正元三年(256年),有数万鲜卑南下雍、凉二州,与汉民杂处。因其主要居于金城黄河以西,故称“河

① 赵俪生:《弇兹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②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38页。

③ 《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子劭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09页。

西鲜卑”。在西晋统治者看来，这些内迁的游牧部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①故对内迁各部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进而引发了以鲜卑秃发氏为首，联合匈奴、羌等族长达30多年（270—304年）的反晋大起义，西晋称“凉州之乱”。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却显示了以秃发氏为核心的河西鲜卑的强大实力和影响。^②秃发鲜卑后来建立了南凉政权，一度成为河西的统治民族。

卢水胡是汉魏十六国时期活动于河西地区的重要部族。不仅在《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和《宋书》等“正史”中屡有记载，而且在居延汉简中也有反映。综合各种材料来看，卢水胡的族源既不是匈奴，也不是羌人、西戎或义渠，而是源自张掖郡南部山区的小月氏，因其世居卢水，故称卢水胡。由于其“依诸羌居止”，曾出现了“羌化”倾向；但因长期受汉文化的熏染，其汉化程度很深。如北凉的建立者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梁熙、吕光皆奇而惮之”。^③时人称赞“沮渠蒙逊，胡夷之杰，内修政事，外理英贤，攻战之际，身均士卒；百姓怀之，乐为之用”。^④十六国后期，北凉政权曾一度控制整个河西和西域的高昌、楼兰等地，并不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水胡的兴衰，与汉魏十六国时期河西社会历史的演进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河西民族交流融合的发展轨迹。

吐谷浑（又称吐浑、退浑）是从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发展而来的。在首领涉归死后的太康四至十年（283—289年）间，其庶长子吐谷浑因牧地之争而率部西迁阴山一带；4世纪初又先后迁到枹罕（今临夏）至西平（今西宁）间的河湟地区，与当地的氐、羌等族相互交融，逐渐形

① 《晋书》卷56《江统传》、卷47《傅玄传》，第1531—1532、1322页。

② 《晋书》卷86《张轨传》载，永宁元年（301年）张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永兴（304—306年）中，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震……于是大城姑臧”（第2221—2222页）。一次俘获十余万口，足见其人口众多、实力强大。

③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④ 《资治通鉴》卷118，晋恭帝元熙元年（419年）五月条，第3728页。

成了吐谷浑。因此,吐谷浑实际上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族属的人们逐渐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具体而言,就是“原慕容鲜卑的一支与羌、氏、汉、匈奴、西域胡、高车等一些氏族、部落,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融合而成”的。^① 329年,叶延根据中原汉族帝王“以王父字为氏”“亦为国号”的传统,以祖父吐谷浑为姓氏、族名和国号。因其地在“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其首领被大夏、刘宋等封为河南王,故又称“河南国”。^② 在阿豺(豺)统治时期(417—426年),“兼并氏、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阿豺死后,其弟慕璿(426—436年在位)即立,乃“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③ 隋初,吐谷浑“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来降”,但可汗夸吕仍不时侵扰河西;开皇十一年(591年)夸吕子世伏继立后,“朝贡岁至”。^④ 由于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之国”,阻隔丝路交通,为廓清丝路、“混一戎夏”,隋炀帝于大业五年(609年)经青海西巡张掖,大败吐谷浑,于其地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徙天下轻罪者居之,大兴屯田,吐谷浑遂日渐衰落。

唐初,吐谷浑乘李渊忙于扫灭群雄和防御突厥,无暇西顾之机,频繁寇边。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派兵征讨吐谷浑,其可汗伏允败亡;由于归附的吐谷浑首领慕容顺为“国人”所杀,唐朝乃立其子诺曷钵为可汗(635—688年),并将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为妻。吐谷浑于是奉唐正朔,遣子弟入侍,依附于唐朝。但随着吐蕃势力的北上,吐谷浑内部也分裂为两派:以丞相宣王为首的一派亲近吐蕃、反对唐朝,以诺曷钵为首的一派依附唐朝、反对吐蕃。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大臣素

① 参见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② 参见《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2539页;《梁书》卷54《河南传》,第810页。

③ 《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80页。

④ 参见《隋书》卷40《元谐传》,第1171页;《隋书》卷83《吐谷浑传》,第1843—1844页。《隋书》卷83《吐谷浑传》作“名王十三人”,可汗“夸吕”作“吕夸”“世伏”作“伏”。据该篇“校勘记”,当以“夸吕”为是。此外,《北史》卷96《吐谷浑传》亦作“世伏”。